

遗产与旅游丛书

YICHAN YU LUYOU CONGSHU

主编 / 邸平伟 彭兆荣

热贡唐卡考察录

彭兆荣 等著



民族出版社

遗产与旅游丛书

YICHAN YU LUYOU CONGSHU

主编 / 邸平伟 彭兆荣

本课程田野调查由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资助

热贡唐卡考察录

彭兆荣 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热贡唐卡考察录 / 彭兆荣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2

(遗产与旅游丛书 / 邸平伟, 彭兆荣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2582 - 1

I. ①热… II. ①彭… III. ①唐卡—宗教艺术—
同仁县 IV. ①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508 号

热贡唐卡考察录

著 者: 彭兆荣等

策划编辑: 张义军

责任编辑: 张义军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7. 125

字 数: 27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5 - 12582 - 1/J · 654 (汉 32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 010 - 64228001 1092781806@qq.com)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遗产与旅游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邱平伟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青海民族大学旅游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负责人
青海省旅游业领域人才“小高地”项目领军人

彭兆荣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青海民族大学特聘首批“昆仑学者”

编 委

李春霞 李 菲 赵春肖 李永梅
刘海玲 张小红 王 辉

热贡概说

热贡，藏语意为“金色的谷地”，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泽库县一带，包括吾屯、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四个村庄，村民们以擅长唐卡、堆绣、木刻与泥塑的藏传佛教技艺闻名于世。从18世纪开始，村民们便携艺云游，前往包括我国青海、西藏、甘肃、四川、内蒙古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佛教寺院从事绘画与雕塑，并与当地佛教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在世代传承中，形成如今“工艺细腻、色彩浓艳、富于装饰”的独特风格。更为有趣的是，四个村庄所擅长的技艺各不相同，吾屯以唐卡技艺闻名、年都乎擅长堆绣、郭麻日木刻好、尕沙日泥塑技艺精湛。对此，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释迦牟尼的高徒路经此地，被当地的旖旎风光、肥美土地所吸引，于是决定造福当地村民，希望他们能在此富饶壮美的山川中美好地生活，于是，他给了吾屯一支毛笔、年都乎一块布、郭麻日一把刀、尕沙日一掬土，从此，吾屯的村民们以绘制唐卡为生、年都乎依靠堆绣为计、而郭麻日凭木刻谋生、尕沙日则为寺院与家户泥塑，各司所长，各美其美，和谐生活于热贡这片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土地上。

彭兆荣

总 序

——留住民族之根

—

当今，文化遗产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许多人在无理性、非理性、半理性之中便匆忙介入其中，不知缘何而来，为何而来，由何而来。任何事物总有个原因，何况一项重大的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的悖论之一，就是人们通常来不及思考，就被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推入，不由自主地跟着走。

如果说眼下的遗产事业为一种潮流的话，那么，全球化才是最大的推手！它席卷全球，并成为一种时代语境，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它都悄无声息地来到你的身边，人们也无助地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将互联网、全球通、银行卡、数字化变成日常生活的惯习；更为无助的是，这些惯习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和认知。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依据是标准化，标准化的一个后果却是多样性面临生存危机，这种逻辑性勿需做深入的辨析，大家都看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仿佛星级酒店，人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以相应的价格享受着同一级别标准的待遇。所有新建的、改造的接待之居、暂住之所、留客之檐都根据标准趋于一致和相似，人们也以相应的价钱、条件、待遇等要求之。

于是人们开始反省和反思，难道我们赖以为生、赖以为据、赖以认

同的文化也要标准化吗？人类文化还需要多样性吗？毫无疑问，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性层面都斩钉截铁。说人类文化多姿多彩，人们没有疑义。就人类的生物性论，一致性大于差异性；就文化论，差异性却大于一致性。人类文化的这些差异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并成为确立、确认、表明和说明“我”的依据。而这些依据的与生俱来归结于那个特定的、所属文化传统的传统——那个真正“我”所归属的族群之根。

逻辑和道理于是变得非常简单，不存在任何晦涩艰奥，如果人们不愿意看到全球化使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威胁，濒临灭绝，或都变得相似和相同，那么，就必须行动起来保护人类丰富多样的遗产，留住人类文化的根脉。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所以，大熊猫、藏羚羊等有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和高级待遇。而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也不例外。

人类在反思中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保护的对象是什么，最终都是在保护人类自己。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与环境生态、关联物种形成生命链条，共生共存。所以，肇端于联合国，具体地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迅速播及全世界的遗产保护事业，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等脉理一致，实际上都可简化为人类的留根事业。



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其归属属性，人的归属属性是一个复杂的构造，有血统归属，性别归属，年龄归属，信仰归属，教育归属，行业归属，阶层归属，政党归属，国家归属等。但是，在世界通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范畴中，民族归属是一个基本的人群政治归属，而与之边界存在交叉重叠的族群归属则旨在强调特定群体的文化归属。前者侧重表述在现代国家范畴中的政治诉求，后者侧重表达其文化根据；所以，民族—族群成了当今文化认同的整体诉求。

逻辑性地，保护文化遗产，即保存文化之根也就自然而然地以

民族－族群为整体单位进行表达与表述。民族刻意于共时性的边界范畴及诉求，族群则突出历时性的根基及传承。这也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遗产公约的基础，即以民族国家为申报主体，即使是近些年活跃于一些国家乃至联合国的“原住民运动”，其背景和依据仍然是“民族国家”，归根结底也是以文化之名求政治之实。

然而，在一个既定的民族国家内部，当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已经成为所属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时，我们所说的民族遗产也就有了这样两种意思：第一，每一个民族或族群自觉成为特定的想象共同体国家范畴内部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其所指为中华民族，在法国称为法兰西民族，在德国称为德意志民族，在日本称为大和民族。第二，民族国家内部某一个具体的民族，政治上隶属于国家这一共同体，文化上则存在着一个族群性独特的发生、认同与传承关系。

许多民族和族群都有地域性，因为他们的生存和生活与特定的地方相联系；尽管许多族群历史上曾经发生大规模、大范围的迁移和迁徙，地缘性也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因为迁移和迁徙大都有一个区域范围，比如游牧民族。所以，文化之根具有地缘性，文化遗产也具有区域特征。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和族群性。

无论是遗产运动还是大众旅游，在我国确属新生事物。与遗产运动产生的社会语境一样，当代的大众旅游也是全球化的产物，是由全球化所催生的，是根据新的社会属性，即所谓移动性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所以，从根本上说，大众旅游是限定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旅游涉及面宽，几乎所有的移动特征都包含其中，如人群移动、文化移动、信息移动、财经移动、技术移动等，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

三

目前在中国，大众旅游与遗产运动一样如火如荼，以往环境相对闭塞的、边远的、按照自然节律生活的所谓“静止的社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旅游大潮的冲击，甚至成为旅游热点，云南的丽江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而青海和西藏也自然成为人们热衷和心仪的理想的旅游目的地，青藏铁路的贯通，使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青藏游成为可能。

然而，青藏铁路沿线原本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族群文化多样性、各类遗产多样性、生态环境的原生态等随着大众游客的纷至沓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变迁，这一隅离天最近的天堂将被大众旅游涂绘成什么模样，无疑都是人们所关注和关心的；它甚至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不仅将其作为理想的旅游目的地，也对其演变态势拭目以待。

唐蕃古道不仅连接了中原与边疆，更传颂着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的历史事件，传颂着汉藏亲善、友好的美丽故事。而在唐蕃古道上发生的各种人员流动、族群交流、文化互动、宗教传播、货物流通、商品交换，成为青藏高原的一道风景线，表现出前移动性的各种特点、特性与特色，也遗留下了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戏是藏族人民历经沧桑养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戏剧剧种，其偶像表演、面具表演等已经成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格萨尔》作为藏族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史诗型的表演艺术，并成为藏戏表演的重要内容，形成了特殊的演述形态。作者以果洛格萨尔藏戏这一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志方法对格萨尔戏剧叙事个案的动态表演结构和交流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观察叙事文本的形式、内容、意义与表演的结合，既对格萨尔戏剧的静态文本加以关注，也对动态演述语境做了精细的记录和描述分析，总结归纳出格萨尔戏剧的表演特点、模式，并强调了格萨尔戏剧具有的说唱戏剧形态，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表演和构建表演理论奠定基础。同时，阐明格萨尔戏剧遗产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与习俗、遗产、神话、根源、传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论证了每个民族的遗产都属于某一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与历史记忆，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往将来的连接纽带。所以，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记忆选择。

唐卡在历史上早已成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值得推崇的绘画技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赫然入选，显示出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在我国最早建立的四个文化生态保持区中，其以“热贡艺术”之名跻身其中。作为佛教技艺中最具表现力和传承性的一种类

型，唐卡以其悠久的历史、卓越的宗教和文化价值闻名遐迩，而面对商品浪潮、旅游活动和市场推手，唐卡由固有传承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它的传承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唐卡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遗产与旅游丛书》包括《青藏铁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以西宁至格尔木段沿线及周边为例》、《〈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以青海果洛地区藏族格萨尔剧演述形态为例》、《热贡唐卡考察录》及《青海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四册，它们都是以青海省内民族文化遗产与大众旅游为主题的调研成果。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应用和实践都能够有些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我作为青海省第一批“昆仑学者”期间（2010—2011）的工作计划之一。我衷心感谢青海省人民政府与青海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各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能够有机会为青海人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因此感到非常快乐！

彭兆荣

2012年8月于昆明荷塘月色

目 录

探索无形之道	彭兆荣/1
交织的和声：热贡唐卡寺院传承专题调查	索南措 张馨凌 李 菲/19
吾屯村落与唐卡传承调查	魏爱棠 兴 安 赵春肖/55
年都乎村唐卡传承现状调查报告	邱守刚 叶高娃/86
吾屯画师的传承和唐卡艺术	李春霞 郭 颖/109
家庭与热贡唐卡传承	郑向春 王艺霖/138
通往佛国的画笔：热贡唐卡师徒传承现状	黄 悦 周雪帆/158
高校教育中的热贡艺术遗产 ——以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唐卡传承与实践为例	曹娅丽 胡青华/198
热贡艺术的政府传承之法	张进福 路 芳/220
后 记	彭兆荣/258

探索无形之道

彭兆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在日本叫做“无形文化财”，在台湾叫做“无形文化资产”。我更喜欢“无形”的说法和译法，无形遗产有无形之道。

有些时候，动物比人幸运，比如大熊猫、藏羚羊和华南虎，还有宠物。宣传上说，那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其实，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多数人并不明白，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天和地是大自然，斗争的结果，是许多物种都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的手。

人类很聪明，他们想到了一种斗争的方式，就是把动植物吃到肚子里去，然后把它们的毛皮穿在身上。吃些动植物是必须的，不然，人类没法活。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越是稀少的物种，人类越是想吃它们的肉，扒它们的皮。像苍蝇、蚊子、老鼠这些动物，人类不吃！偏要吃熊胆、鹿茸、鲸肉。

人类很势利，他们请来“万能之神”金钱，把越是少的物种价格哄抬上了天，越是贵的东西，人类就越是想杀戮之，越想咀啖之。于是，那些物种就越来越少，有的已经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

忽然有一天，人类明白了一个道理：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类发现，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少，人类自己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大。生态被破坏，许多物种难以为继，人类饕餮的欲望，几乎把自己逼上绝境。于是，他们开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其实，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可人类偏偏要强调保护它们。

人类也会举一反三，既然生物物种越来越少，回头看一看，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物种”是否也面临同样的窘境？蓦然回首，人类大惊失色，随着全球化风暴的席卷，许多文化物种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人类想出了不重复的词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文化多样性。

仿佛人类忽然有了觉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国家，到省，到区，到市，到县，到乡，都行动着“申遗”。但知其要者并不多，知其道者更罕见。窃以为，人们对时下的“非遗”运动，凑热闹者占多数，就像一人看天，众者围观，天是什么无所谓；一人低头，众者都俯视，地是什么也无所谓，反正有人看天看地，我们就跟着看天看地。这一层为众者。有少部分人明白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或重视、或保护、或抢救、或欣赏、或收藏，他们只关注对象本身。京剧、昆曲、少林、针灸，彼时此时，风水轮转，因为它们值钱，因为它们吃香，因为它们时髦。无论严肃的、认真的、使命的、责任的、任务的、业绩的、指示的、指标的、保值的、投资的、投机的、盲目的、盲从的……这一层为寡者。

还有一层为罕者。他们明白：那些跟人看天看地者，除了从众，其他没剩下什么；再来一个什么“捣佛运动”、什么“毁淫寺运动”、什么“破旧立新”，他们还跟着干。这些人明白：那些只知物、不知物理，只知非遗、不知非遗之道，只识物相、不识其脉者都是近视的，他们不独要体察无形遗产的表面之相，更要去探索无形文化遗产的无形之道。只有他们既能观察表面之相，亦能触及内在之脉。

“遗产”之“遗”本义为传续、继承、因袭。“产”即“财产”。就遗产而言，无遗便无产。产有形，遗无形。产为相，遗为道。只有寻到了无形之道，发扬之，光大之，才是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也才有可能真正保护好它，文化多样性的绚丽景观也才有逻辑依据。

人们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把人类的文化遗产当作一个生命的连续体，生成养育也就构成了生命不可分离、中断的过程；就像一个孩子的生养过程一样。而“养”相比“生”更重要，也更持续。文化

遗产也包含同样的道理，人们经常为某一文化遗产而惊叹，却忽略了养育过程，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养育制度。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更为复杂、更为独特、更为多样、更为经久的生养制度，人们也就没有可能在今天看到、接触到那些丰富的文化遗产。

“传承”（传习所、传承人）这些年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仿佛它是个新东西，其实不然。就文化而言，无论我们是否强调“传承”，传承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它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和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在今天强调“传承”，不过是试图强化那些在现代语境中被凸显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程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使之成为生活的惯习，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关系、生产制度、生养方式、生业组织，它们都化作了人类生性的一部分，信仰、认知、智慧、劳动、经验、仪式、节庆、口述、书写、音乐、舞蹈、绘画、曲艺、饮食、治疗、服饰、工具等无不融入人类日常生活之中，它们是平凡的，又是非凡的。人们正是在这些“遗产”的传承中生活着。所以，强调它们与否，它们都存在。这些存在与生命的延续，生活的继续早已融为一体，其本身就是传承，就在传承。

人们在今天强调“传承”，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那些濒危的、有价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需要人们去拯救，人类在此仿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其实，这个逻辑似是而非。试想，人类在历史上有多少遗产已经消失和消亡，其中多数是人类的选择性放弃。

但人类毕竟有怀旧感，不是所有旧的东西都全部丢弃，人们会像翻阅老照片一样珍藏一些他们认为值得记忆和纪念的东西、事情，会坚持和坚守一些老的习惯。其实收藏何尝不是一种传承？所以，传承永远是人类最值得称道的秉性；同时，传承也是人们自觉进行的选择性记忆方式。何况，无形遗产通常是活态的，是人类的生活常态。

当然，人类毕竟只能活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而每一个历史时段都有特殊的价值观，人们很难超越它。在我们的记忆里，40年前人们认为最“坏的”、最“危险的”、最“烫手的”东西，今天却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最“炙手可热”的东西。30多年前，许多人都在毁坏、破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许多人（甚至

包括他们中的一些人)又都成了曾经破坏同类东西的保护者。很难说,“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不是一种特殊的“传承”。这要怎么说才好?语境使然,历史使然,价值使然。

如果只说到这里,似有不负责任之嫌,好像所有的事情推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段,都是历史的“错误”和“误会”。难道人类就只能受到某一个历史时段的桎梏,只充当识时务的“俊杰”,而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永恒关怀和对真理的终极追求?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人类只是眼前利益的追逐者,那么,人类或许早已灭绝。我们今天有幸看到、听到、说到、闻到、尝到、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欣赏到、审美到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长期保护和传承下来的。

在我们言说和枚举了这么些有关的“传承”方式、事象、事例和事件以后,我们发现,这些方式、事象、事例和事件其实都不过是浮在外部的表象,真正潜匿于内的是它的道理和规则;而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探索的。其中包含着两种求索路径:一是任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都有其符合道理的“共相”,二是任何一项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都有其特殊的传承规律和规则。没有足够的案例,很难求得对两种传承之道的把握和掌握。

所以,探索无形文化遗产的“无形之道”也就成了我们的思路和目标。根据这样的思路和目标,围绕这样的主题,2012年七八月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重大课题项目组一行21人来到青海黄南州,对热贡唐卡的传承制度和方式进行调查。我们之所以选择其作为调研的对象,一则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二则它是我国最早的四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三则它是藏传佛教中最具特色的绘画形式之一;四则它具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遗产的特色;五则它具备了多种传承的样态和方式。于是它成为本课题10个调查对象和案例中的一个。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热贡唐卡艺术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规律,我们根据项目需要,把调查人员分为7个组,包括:寺院组(主要了解藏传佛教体系中的唐卡传承制度和方式);社区组(主要了解当地社区、民众、家庭制作和传承唐卡的方式);行业组(主要了解在热贡地区唐卡制作

的专业性协会、行会的情况)；画院组(主要了解热贡的各类画院、培训学校、传习所等)；政府组(主要了解当地政府在唐卡申遗、保护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工作情况)；市场组(主要了解唐卡艺术的市场情况，特别是在唐卡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的市场变化情况)；大师组(主要追踪访谈唐卡艺术大师的个人经历和成就以及作为传承人的情况)。

为了掌握整体和全面的情况，我并没有具体地参加某一个组的调查工作，而是在不同组之间穿梭。事实上，此次20多个团队成员由清一色的专家、教授、副教授、博士后、博士、博士研究生组成，他们中有的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有的本身就是藏族，其中好几位曾有在世界名校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或即将前往世界名校的人类学系师从世界级人类学大师学习。我很自豪，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更为他们而自豪，因为他们早已能够独当一面，有些已在相关学术领域成为后起之秀。所以，我并不需要事无巨细，只需要掌控大局，定时听取每组组长汇报工作。这反而使我比起以前的调查更有机会观察对象的细节，它们就像一滴滴的露珠，却足以反射太阳的光芒！

一、无形的话语

人类学的力量来自于广阔的田野，我们把这种工作叫做“田野作业”。费孝通先生把它形容为“解剖麻雀”，意思是说，通过细小的、具体案例的参与观察、细致了解、客观分析、发现规律，达到举一反三，反观全局。人类学研究的是“社会细胞”，社会是由最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所组成，所延扩。所以，田野工作通常都在草根社会中进行，琐碎繁杂，日常平俗。但人们相信，乡土社会、草根社会有大智慧、大知识、大历史，因而也有大真实。而这些都深藏在平常和细节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某种无形话语和规则。

通过近30年的田野经验，笔者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朴素的方法，比如，如果做传统的民族志田野调查，需要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参与观

察，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借用官方的力量，而是直接进入村落社区，与民众打成一片，和他们做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同劳动，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贵州荔波瑶麓乡调查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寨老上山放牛，俩人吃住在山上长达数日，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我的田野调查一次近 3 个月，而且 10 年间去过 5 次。这种情况，我不需要任何一级政府官员的陪同，甚至几乎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在 10 年期间，我没有见过任何州、县一级的主要行政领导，绝大多数部门领导，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静静地融入地方社会，加上一丁点的所谓田野技巧、田野方法，你就可以较为全面、完整地了解你的对象。

勿需讳言，在中国，官民存在芥蒂、隔阂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我们的历史没有养育出完备的民选制度，所沿袭的是“父母官”传统。父/子的礼仪在孔夫子时代就成严格、严厉定制。所以，如果我们的田野走的是上层路线，比如由官员领着下去，调查者会被认为是官方派下来的，那么，在访谈的时候，你的对象可能也会给你讲官话、套话。而要改变这种官话、套话局面反而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而，近些年来，我国的科研进入到了一个“项目时代”。许多项目的时效性、工具性、目的性、目标性、功利性决定了这是一种在“长时段历史”中称为“海上浪花”的现象，即短时效应，它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人类学者长期潜心的田野调查模式，虽然一些应用人类学家也做类似的项目研究。这种调查通常目标单一，目的性强，时间短，上述方式便不适用，因此经常需要借助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甚至借用和利用主要领导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产生“短期效应”。当然，这样的方式也会伴随一些弊病。此次调查就反映了这样的“关系力量”，其中深蕴无形的话语规则。

我们这次黄南之行，本质上说是项目性的，整体团队的调查时间只有一周，虽然我本人已经是第三次来，但多数成员是第一次。而且就项目设计而言，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是我们了解的重要一环，所以，官方的“关系效应”必须利用。好在团队里的藏族弟子与黄南州文化局领导认识，这样我们便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所需职能部门的信息和资